



福建出版史

李瑞良 著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福建出版史话

李瑞良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 361009)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六印路 30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8.626印张 2 插页 197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10-435-6

G·180 定价: 11.8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吴道弘

记得小时候在浙江老家，每逢旧历年节，母亲总要拿出珍藏着的古色古香、漆质红润的果盘，盛放蜜饯、糖果，准备招待新春到家来的亲友。那种光彩的果盘，真是很精巧的实用工艺品。孩子的心理只觉得可爱新奇，母亲则说，这是福建的著名特产脱胎漆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福建有多远。后来上中学的历史、地理课，逐渐知道闽江和武夷山，山灵水秀。福州、厦门是近代五口通商的两个口岸，泉州的繁荣和鼓浪屿的风光，令人遐想。福建又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朱熹、林则徐、严复都是福建人，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就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总之，那时我对福建的人文、地理充满向往。在三十多年以后，我有机会登上临江耸立的鼓山，饱览如画的风光，在鼓浪屿缅怀郑成功的事迹，在著名侨乡泉州，从壮观的开元寺联想到古代泉州港的兴盛，由满城的刺桐树引发思古的幽情……然而我对于福建的历史文化委实了解太少了。

福建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文明。唐时出现的书院到宋代已经有发达的教育文化，涌现出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编辑家、诗人和科技人才。应该指出，福建的出版文化在福建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印刷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当时福建是我国三大刻书

中心之一。大量刊行著述，“建本”、“闽刻”享誉国内外。清末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绝句》曾有“建宁书本满人间，世历三朝远百蛮”之句。如此繁盛的刻书业，表明学术文化的发展，对封建社会的科举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无疑也直接促进了福建文化的发展。

最近读郁达夫的日记，记载 1936 年他在福州一年多的短暂时间里，几乎每天跑书铺买书籍，而那里的名版古本、旧书典籍，实在太多。据他后来回忆说：“杭州沦陷之前，我在福州，当时只带了几部极简略的书在身边；后来在福州临时添买的古今杂籍到这次南行时止，也有二千余册了，现在尚存在永安的省府图书馆内。”（《图书的惨劫》）这固然是郁达夫爱书买书之勤，也正说明半个多世纪以前当地书肆众多，新书旧籍之丰富。这无疑又加深了我对于福建出版文化史的了解。

我很早就读过李瑞良先生关于福建出版文化史的文章，印象深刻，并产生很大的兴趣。1992 年 10 月中国编辑学会成立，有编辑出版史研究的任务。第二年冬天，中国编辑学会与湖北省编辑学会联合在武昌召开的编辑出版史研究座谈会上，我与瑞良先生有深入晤谈的机会，获益不少。瑞良先生是资深的编审，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学识广博，兼善文史，长期坚持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包括中国图书史、中国出版史）很有造诣。论著有：《中国目录学史》、《秦汉时期的书籍文化》、《目录学与编辑学》等，目前正在写作三十多万字的《中国图书流通史》。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从 60 年代初起，瑞良先生每天清晨 4 时半起身，做室内八段锦，到室外舞剑、练气功，无论寒冬炎夏、风晨雨朝，天天如此，三十多年如一日，至今不辍。这种坚韧毅力是很罕见的。这样顽强的意志力量跟他在几十年里钻研学问、勤奋创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是相通的。后来我们交谊日深，还知道他酷爱书籍，以读书

为乐，每到一个地方，总要走访书肆，浏览书刊，广搜博采。但他的兴趣爱好也很别致，他收藏的手杖，已有数十种。每次游览名山胜地，从来不忘搜求各式手杖，从形制到质料，精心选择，摩挲玩赏，确是一种陶冶情操的高尚审美活动。

瑞良先生作为闽人，尤其关心和重视故乡福建的出版史；这本书是他潜心研究、钩稽史料，主要用史话形式写出的普及性研究著作。原稿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时，就已引起国外有关研究者的重视。美国一位大学的历史学研究生曾经为出版史专门向瑞良先生请教。因此，本书对于传播地方出版史知识，促进出版史、印刷史和编辑史的学术研究，都是有价值的贡献。同时对于充实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和促进中外交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写到这里，我还以为学术研究中的普及工作，至今仍没有引起普遍和足够的重视。广大读者十分需要各种学科的优秀通俗读物，具有科学内容、形式生动活泼的通俗读物的写作与出版，仍然是学术著作界和出版界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希望编辑出版工作者重视并努力出好通俗性的学术著作。我也希望广大青年编辑出版工作者能够读一点编辑出版史读物。我国悠久的出版历史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时代在发展、前进，但是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仍是不可少的。如何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和启示，对于培养、提高全体出版人员的素质，提高图书质量，会有所裨益的。

北京的初冬，已有寒意。然而晴日临窗，身上是一片暖暖的阳光，此刻我很乐意为我的编辑同行写下这些文字，权且作为本书的序言。遥想南国，一定还是碧水青山、榕绿花明吧。

1995年11月24日

前 言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图书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产物。“出版”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图书的编辑、印刷出版和发行，其中图书编辑工作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印刷出版和发行属于物质生产范畴。因此，出版史就是反映图书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结合的历史，不同于印刷史或刻书史。

我国出版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雕版印刷为主要制作方式的历史，从唐代后期至清代末期，即公元9世纪到19世纪末，前后就有1200年左右。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图书的编纂事业和刻印事业紧密结合，同步发展，交织成一部丰富多彩的出版事业史，对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古代出版史上，福建出版业是一枝亭亭玉立的奇葩。它不仅是福建地方文化的一项优秀遗产，而且是中国出版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刻书业而言，福建起源早、发展快，有点有面，遍及八闽，自宋至清，历久不衰，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技术之精和流传之久，都是全国少有的。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福建建阳麻沙和崇化的刻书业，早在南宋时，就被称为“图书之府”，“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这一特异的文化现

象，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复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福建地处祖国东南，在历史上远离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交通比较闭塞；但也避开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漩涡，社会相对安定。自战国秦汉以后，经过几次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大规模碰撞、融合，福建地方文化自唐代后期即蓬勃兴起，不仅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而且拥有自己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历史积累。进入北宋以后，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地理上，福建背山面海，既囿于山海之隔，又兼有山海之利，海外交通的开拓和海上贸易的繁荣，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海外贸易带来了占城稻、甘蔗、番薯、烟草、木棉等农作物新品种和新技术，使福建成为中外生产技术的交流站和农业新品种的试验场。福建气候温湿，果树和经济作物繁盛：荔枝、龙眼从唐宋时就闻名天下。蔡襄的《荔枝谱》是历史上第一部果树专著，反映了闽中经济作物生产的高度发展；闽茶在唐代已列为贡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泉州在宋元时已成为远东数一数二的国际性港口，海舶云集，国内外商人络绎不绝，进出口货物堆积如山；福州历来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到宋代已成为“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都会。总之，自宋以后，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崛起。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生产技术的传播，经济开发由北而南，由东到西，被及八闽大地，以至“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饶确之地，耕耨殆尽”（《宋史·地理志》）。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沿海交通的发达，商品细胞迅速繁殖，深入穷乡僻壤，形成出版业繁荣的社会经济背景。

经济的繁荣伴随着文化的发达。福建从唐代起就出现读书好学的社会风尚，中唐以后逐渐成为科举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宋史·地理志》说：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

尤多。”据统计，宋代书院共 229 所，其中福建就有 18 所，仅次于浙江。宋人说：“福建出秀才，为天下第一。”宋代共举行进士科考试 118 次，录取进士 3 万多人，其中福建籍 7000 多人，约占四分之一。读书向学和科举发达的风气产生了济济人才。《容斋随笔》说：“七闽二浙，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北宋以后，福建名臣显宦屡见，文人学者辈出。《宋史》列传人物共 548 人，其中福建籍 88 人，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位。明代福建科举仍极盛。明代共有进士科 89 科，录取进士 2 万余人，其中闽籍进士 2410 人，约占八分之一；状元 89 人中，闽籍有 11 人，约占十分之一强。科举应试人员不断增多，意味着文化的普及面在不断扩大。随着读书人的增多和科举文化的发达，文人学者辈出，书香遍地，著作如林。据初步统计，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历代 3500 多种著作中，闽人著作约有 300 种，经、史、子、集各类中均有产生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著作。文化的发达和科举用书的需求是促进古代出版业繁荣的客观因素，而著述宏富和文人众多又为出版业提供了巨大的稿源和充足的编校人才资源。

福建山多林密，雕版印刷所需的木材和纸张一向是大宗的传统产品。闽北一带更盛产竹木，雕版用木和印书用纸，就地取材，用之不竭，更具备发展刻书业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充足带来的资源优势，刻书业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带来的经营优势，科举发达、文人学者众多带来的人才优势，这些优势的综 合，形成了福建古代出版事业繁盛的力量源泉。

这些年来，我在工作和文化史研究中接触不少福建出版史的资料，随看随摘，不觉其多。但由于杂事的干扰和时间精力的限制，一直没能把撰写一部系统的福建出版史排上日程。近几年来，《出版广场》编辑部的盛情约稿启发了我，在整体计划之下，我采取史话形式，分篇撰写，随写随登，可分可合。这就是这本《福

建出版史话》的由来。

本书是出版史，不仅仅是刻书史。内容除谈刻书外，还包括古代的编辑、校理、流通、广告宣传和出版管理等方面。书中着重介绍福建历史上的图书编辑事迹，这是前人还没有专文论及的。许多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历史人物，或多或少都从事编校活动，一些不甚知名的编辑出版家的事迹更值得挖掘。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反映古代刻书业方面，本书采取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法，既有各个时期的概说，也有重点介绍。全书论述范围限于雕版印刷时期，即从北宋至晚清。考虑到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需要，本书以知识性为主，但带有学术性。各篇排列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

衷心感谢《出版广场》的主编于乐人、赵文淦、黄正慧和编辑部诸同志，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本书得以分篇在这个刊物上连载。在连载过程中，不断得到同行和朋友的鼓励，有的还打听什么时候出书。鹭江出版社社长游斌同志曾经一再向我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并说赔钱也要出。正是这种热情给了我结集出版的勇气。尤其难得的是，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吴道弘同志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并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序言，增添光彩，令我感激不已！

本书写作时断时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5年12月，白楼小窝

目 录

前言	(1)
一 我国古代出版业的缩影	
——福建刻书业在历史上的地位	(1)
二 背山面海和书山学海	
——福建古代刻书业的历史背景	(5)
三 万绿一红 众星拱月	
——宋元时期福建刻书业盛况 (一)	(11)
四 话说“图书之府”	
——宋元时期福建刻书业盛况 (二)	(16)
五 宋代四大书的闽籍编修官	
——福建古代第一批编辑家	(21)
六 编辑家的开拓	
——北宋前期福建文人的编辑工作	(26)
七 闽人的史学著作为什么繁荣	
——刻书业与编纂事业的关系一例	(31)
八 史学家的编辑意识	
——从编辑角度谈郑樵和袁枢	(36)

九	文学领域的编辑耕耘	
	——宋代闽人的文学编辑工作（一）	（41）
十	诗词选家的取舍标准	
	——宋代闽人的文学编辑工作（二）	（46）
十一	诗话中的编辑劳动	
	——宋代闽人的文学编辑工作（三）	（52）
十二	藏书家的编辑工作	
	——宋代闽人编辑工作拾零（一）	（57）
十三	职业编辑的牟利手段	
	——宋代闽人编辑工作拾零（二）	（62）
十四	刻书业的重大实践	
	——宋代福建刻印的佛藏和道藏	（68）
十五	早期出版管理的重点地区	
	——宋代出版管理与福建刻书业	（72）
十六	一代盛业	
	——元代福建刻书业一瞥	（77）
十七	从遗民到国史编修	
	——元代福建出版家、编辑家	（81）
十八	书籍形式的演进	
	——元代建本版刻特点	（87）
十九	持续发展的又一高峰期	
	——漫话明代福建刻书业	（93）
二十	时代特征的反映	
	——明代福建刻书业风貌	（98）
二十一	一代风气	
	——明代福建的家刻	（104）

二十二	从《唐诗品汇》到《永乐大典》	
	——闽中十才子的编辑工作·····	(110)
二十三	编纂和编辑的结合	
	——作为编辑家的李卓吾·····	(115)
二十四	朝廷大臣和福建刻书业	
	——李廷机和叶向高·····	(120)
二十五	传播《金瓶梅》有功的抄书家	
	——谢肇淛的编辑活动·····	(125)
二十六	省志的开拓者	
	——黄仲昭和何乔远·····	(129)
二十七	文史摘编和地方文献的整理	
	——明代闽人文史编辑拾零·····	(134)
二十八	出版家兼小说家	
	——熊大木和余象斗·····	(140)
二十九	地方官的编刻活动	
	——李元阳在闽刻书事迹·····	(145)
三十	别开生面的方志编纂	
	——叶春及和《惠安政书》·····	(150)
三十一	文学家编地方志	
	——冯梦龙和《寿宁待志》·····	(154)
三十二	八百年间只此一刻	
	——两部大书的明代闽刻本·····	(160)
三十三	印刷技术的另一枝花	
	——明代福建的活字印刷·····	(165)
三十四	市场意识和广告手段	
	——明代建刻的广告宣传·····	(170)

三十五	政令直指建阳	
	——明朝官府对福建刻书的管理·····	(176)
三十六	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转折	
	——明末清初的福建刻书业·····	(181)
三十七	文人心目中的麻沙	
	——清初名人和福建刻书业·····	(186)
三十八	寄爱国激情于编辑工作	
	——黄道周和《广名将传》·····	(191)
三十九	徘徊于编辑与撰著之间	
	——曹学佺的编辑活动·····	(196)
四十	从《狗马史记》到《宁化县志》	
	——李世熊的编纂活动·····	(201)
四十一	藏书家兼编辑家	
	——黄虞稷的编辑事迹·····	(206)
四十二	热心编刻事业的福建巡抚	
	——张伯行和《正谊堂全书》·····	(210)
四十三	在刻印大型图书中显示力量	
	——清代福建的官刻·····	(215)
四十四	失去中心地位之后	
	——清代福建的坊刻·····	(220)
四十五	一生陷于政治漩涡的编辑家	
	——陈梦雷和《古今图书集成》·····	(225)
四十六	“仰承圣意”的编辑家	
	——李光地的编辑事业·····	(229)
四十七	隐没于集体之中的编辑家	
	——蓝鼎元的编辑事迹·····	(234)

四十八	皇太子师傅编书	
	——蔡世远的编辑生涯·····	(239)
四十九	省志编纂不易	
	——修纂《福建通志》的前前后后·····	(244)
五十	两岸文化沟通一例	
	——清代台湾刻书·····	(250)
五十一	商务馆的“福建帮”	
	——福建出版史余话·····	(255)

一 我国古代出版业的缩影

——福建刻书业在历史上的地位

福建古代刻书业是福建文化的骄傲，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福建刻书业在宋代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本和浙本、蜀本鼎足而立，各具风格。在古代史上，福建刻印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技术之精和书籍流通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闽刻”和“建本”已成为版本学上的常用术语。为了反映福建文化的这一特色，《民国福建通志》特辟“版本志”，开创了方志编纂上的新体例，由此可见一斑。

福建出版史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它具备了许多条件和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我国雕版印刷发端于唐，崛起于五代，兴盛于宋元，到明代而臻于极。在这段历史中，福建一直处在全国前列，可以视为我国古代刻书业的缩影。可以说，几乎从雕版印刷发明和使用之日起，福建就有刻书业，而且很早就崭露头角。我国现存最早的雕印书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卷子本，而据文献记载，唐代闽北一带就有书肆，唐末五代福建就刻印书籍。王审知为徐寅刻印《钓矶文集》，就是一个例证。到宋代，福建刻书业已居全国首位：“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

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书林清话》卷二）元代刻书盛况超过宋代，福建书坊更为繁荣，出现了许多刻书世业。例如建安余氏书坊，从北宋一直经营到元末。明代坊刻遍及全国，福建刻书地点也更加普遍。嘉靖《建阳县志》绘有一张书坊图，还编有书目，反映了当时盛况。直到清初，麻沙书坊仍很有名。朱竹垞有诗云：“得观云谷山头水，恣读麻沙坊里书。”（《曝书亭集·建阳诗》）查初白《敬业堂集·建溪棹歌》：“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闽杂记》卷八引）从那以后，才逐渐衰落。这样，福建刻书业从盛到衰，持续了七百多年。到近代，又翻开了另一页。

二是点面结合，遍及八闽。

从经营性质说，古代刻书业有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和坊刻。官刻是指中央和地方部门单位用公帑投资刻印，家刻指家宅、家塾、祠堂等用家族积累或募捐刻印，坊刻指书坊、书肆经营刻书业。官、家刻书，意在流传，坊刻旨在牟利。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始，因耗费大、成本高，刻印数量不多，后来技术设备改进，成本降低，书坊有利可图，才逐渐普遍。（元、明以后，坊刻成为雕印事业的主体。）福建刻书业发展到南宋以后，官刻、坊刻和家刻都很繁盛，而且刻书地点遍及全省各地，有点有面。就官刻说，从司、库到府学、郡斋、县学都有。根据手头资料，刻书单位有名可考者，有福建转运司、福建漕治、泉州公使库、三山学官、兴化府郡署、莆田郡斋、临汀郡庠、延平郡斋、建安书院、邵武县学、永泰县学以及建溪、福安、长乐等县。北京图书馆藏本就有福建转运司刻《太平圣惠方》100卷（绍兴十七年刻）、泉州公使库刻《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80卷（淳熙十年刻）、莆田郡斋刻《后村居士集》50卷（淳祐九年刻）、永泰县学刻《宋宰辅编年录》20卷（宝祐五年刻）等。家刻之有名可考者，有建安黄善

夫宅、建安魏仲举家塾、建安陈彦甫家塾、建安蔡子文家塾、建安虞氏家塾、麻沙虞叔异宅等。坊刻在福建尤为发达，除沿海地区外，大多集中在建阳和建安，特别是麻沙、崇化两地。麻沙书坊有名可考者，除著名的余氏勤有堂、万卷堂外，还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陈八郎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建安虞氏务本堂、朱氏与耕堂、高氏日新堂、叶氏广勤堂，建安宗文书堂以及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等。关于麻沙书坊，以后将另文介绍。总之，从山区到滨海，都有刻书作坊，分布地点相当普遍。

三是技术发达，规模宏大。

宋代以后，福建刻书业之发达，特别是建阳麻沙、崇化刻印数量之多和流通之广，居全国首位，当时号称“图书之府”，“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远销日本、高丽等地。流传之广说明印数之多，而印数之多是跟刻印技术之精和规模之大相联系的。福建多林木，雕版材料易得；闽北山区产竹，造纸原料易求，造纸业和雕印工艺随着书坊的开设而迅速发展。书坊作业训练出一批批刻版、印刷、校勘、设计、装订等工艺的技术人员。宋版书到明代以后就成为珍品，而现存宋版书大多数是麻沙版。清朱竹垞《经义考》记载：“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圣，莹然可宝者。”说明建刻技术之发达。彩色套印和活字印刷发明以后，技术更为精进。可以说，麻沙版代表了古代刻印技术水平。

宋、元时福建刻书的技术和规模，可以从佛藏和道藏的雕印工程中看出。有宋一代，前后雕印大藏经六部，其中就有两部是在福州刻印的。一是《崇宁万寿大藏》，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在福州东禅寺开雕，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竣工，前后23年。全藏共6434卷、580函，规模比开宝年间在四川雕印的《开宝藏》还要大。今传东禅寺《华严经》卷八十有题记。另一部是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在福州开元寺